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30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巴比特

〔美国〕辛克莱·路易斯

（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潘庆龄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巴 比 特

〔美国〕辛克莱·路易斯

（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潘庆龄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巴 比 特

〔美国〕辛克莱·路易斯

〔1930年获奖〕

潘庆龄 姚祖培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插页6 字数392,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2,251—26,650 册

ISBN 7-5407-0051-3/I·34

定价: 平 装 12.00 元
彩盒精装 17.50 元



「美国」辛克莱·路易斯 (1885—1951)
(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①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今日，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 3 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 19 种的 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袁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美国“繁荣”年代的史诗

纪念路易斯一百周年诞辰

潘 庆 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是美国经济呈现繁荣的年代，也是美国文学的繁荣时期。当时在群星璀璨的美国文坛上异军突起，以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使美国文学获得新的活力”^①的，就是来自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大草原的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特别是在一九三〇年，路易斯“由于他的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头一个美国作家，这一事实标志着：美国文学臻于成熟，开始在全世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路易斯一生创作丰富，写过二十多部中篇小说，重要的有长篇小说《大街》（Main Street, 1920）^②、《巴比特》（Babbitt, 1922）、《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1925）、《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 1927）、《多兹沃兹》

① 语见哈里逊·史密斯为《从大街到斯德哥尔摩》一书所写的序言。

② 拙译《大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Dodsworth, 1929)。其中《大街》和《巴比特》历来脍炙人口，但从作品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来说，似乎《巴比特》写得更为成功。路易斯创造的巴比特，既是文学中的典型，又是社会典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有一些美国学者撰文认为，路易斯揭露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提出了至今仍值得美国深思的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小说”的滥觞。（即使路易斯只是针砭时弊，提不出疗救之道，也是值得称道的。）尽管路易斯是美国文坛上毁誉不一、争议颇多的作家之一，但文学批评家一致认为，研究现代美国文学，如果不认真阅读路易斯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路易斯以前，美国社会的真实情景都被充满乐观幻想的浪漫主义情调遮盖住了，美国人指望能从小说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要求更为热切，因而使路易斯描绘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事实的确如此，《巴比特》书中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现实感，直至今日仍然深深地吸引了读者。为此，美国著名路易斯传记权威马克·肖勒教授（Prof. Mark Schorer）饶有兴味地举出了两个生动的实例加以佐证。一个实例是：南加利福尼亚某州立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在讲授美国小说时，谈到《巴比特》主人公在泽尼斯市地产同业公会宴席上的演说（详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认为巴比特这篇演说的某些片段不妨当作读者来信投寄当地保守报纸，备不住也会照登不误。这一建议立即引起哄堂大笑。那位教师随口说过也就忘了，殊不知在下周某报“致编者”一栏内果然见到那么一篇读者来信，文字上原封不动，只是将年代从一九二二年改为当前的一九六七年，读者署名则为

路易斯·辛克莱。他不免大吃一惊。两天以后，这个读者——大学生还收到一封表示“完全赞同”的来信，要求他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支持某右翼候选人。这个大学生又以仿效路易斯——巴比特式的滔滔辩才写了一篇谤文，果然又在报端披露了。这桩趣事雄辩有力地说明：乔治·福·巴比特和辛克莱·路易斯，至少在加利福尼亚圣迪戈又复活了。另一个实例是说：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办一套题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节目，要求将所选的小说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同现实生活中可以类比的场景镜头并列在一起，演员则由职业演员和普通公民分别担任。这一套电视节目即以小说《巴比特》开始，演出如同小说本身一样，气氛闹热而又生动逼真。翌日，《纽约时报》电视评论家撰文说：导演将摄影机对准明尼苏达州都卢斯市狮社聚会，乔治·福·巴比特简直演得活灵活现。他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不由得使观众想到自己身上都有一点儿巴比特的味道。

一部长篇小说，历经几十年之后，依然跟美国现实生活如此息息相关，而又扣人心弦，这在美国小说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路易斯确实高瞻远瞩，富有眼力，能够预示出不久即将在全国喷薄而出的重大历史转折，这种非凡的洞察力无疑是他的长篇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路易斯描写美国乡村生活呆滞僵化的《大街》出版的那一年（1920年），可以说正式宣告美国乡村生活已成了一潭死水。根据一九二〇年人口调查表明，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之间某个时候起，美国社会已由乡村逐渐演变成城市社会，在这期间，原来占人口多数的自耕农和村民已经退居少数，而城市居民却一下子成为新的多数了。无独有偶，《巴比

特》恰好从一九二〇年春写起。当时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繁荣，资本主义在迅速扩张、发展，有产者和暴发户的财富就象滚雪球似的增长着。读者可以看到，《巴比特》写的不仅是这个繁荣兴旺的新的城市社会，而且还跟这个新城市对社会风尚、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以及生活方式所持的态度紧密相关，这些态度不用说又和当时美国商业文化^①联系在一起。

《大街》还没有脱稿，路易斯就在考虑写下一部小说了。他说这部小说性质虽与《大街》相似，但故事情节迥然不同，这次写的不是卡萝尔式人物，而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一个厌倦了的生意人，地点不是在戈镇，而是在拥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城市（相当于明尼阿波利斯，或西雅图，或罗彻斯特，或亚特兰大），此人就是来自莫纳克城（Monarch）的G.T.彭佛瑞（Pumphrey），书名《彭佛瑞》。也许读者都还记得，在《大街》接近尾声处，戈镇确实正在朝着泽尼斯（Zenith）迈进。戈镇商会为了招徕新的企业客户，开展了一场“繁荣戈镇运动”，唱主角的是一个新来的陌路人，名叫“诚实的杰姆·勃劳塞”，其实此人堪称一个“干劲十足”的地产投机商。在戈镇为他举行的宴席上，“大家简直就象演说家似的引经据典地畅谈什么要鼓气，要苦干，要有精神，生龙活虎，富有事业心，而且还要意志刚强，当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接着照例谈到什么漂亮的女人，本乡本土，詹姆斯·J·希尔，又从蔚蓝的天空，碧绿的田野，一直谈到庄稼丰收，以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投资后的高额利润，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煽动者，美国政体稳

① 这里大概指美国旨在营业的、或反映商界生活的文化，以下皆同。

如磐石的基础，参议员克努特·纳尔逊，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光荣的业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①这里汇集了美国商业文化的全部陈词滥调，而且这一片令人刺耳的喧嚣也只说明美国工商企业界还处在最粗俗的中产阶级水平。其实，这就是为活跃在二十年代的地产商巴比特铺设的活动舞台。有的评论家指出，《大街》终止于一九二〇年，正是为刚过去的这个十年所唱的一支挽歌；而《巴比特》起始于一九二〇年，正是为令人晕头转向而又常常没头没脑的扩张的这个十年所演出的前奏曲。因此，《巴比特》就是美国所谓“繁荣”年代的史诗，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不失为整个美国商业文化在文学上的重要纪述。

《巴比特》是路易斯根据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写出来的头一部小说。他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王后城俱乐部》(Queen City Club)建立了一个Pied-à-terre②(书中的泽尼斯，想必就是按照辛辛那提为原型)，作为深入生活，观察、分析、研究各人物的基地。首先，他选择中产阶级内一个次要阶层——小商人及其地产生意作为题材，接着随身携带笔记本，同小说里着意描摹的那一类人物厮混在一起。在普尔门式豪华卧车包厢和吸烟室，在各大饭店、餐馆休息厅，在名目繁多的俱乐部，甚至在街头巷尾，路易斯都细心观察，留神倾听，注意人们的言谈吐属，包括常用的口头禅，以及独特的口语、俚语、行语、黑话、双关语，乃至某些个别字眼的特殊发音方式。由于他的听觉特别灵敏，善于捕捉人物之间生动活泼的对

① 详见拙译《大街》，第633页。

② 法语：歇脚处，或临时寓所。